

编者按

南南和三方合作可以有力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和贯穿各个目标的性别平等原则。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前夕,本文作者回顾了南南合作与妇女议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主要历程。展望未来,作者认为在推动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并进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再次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表率,可以更多地向世界分享把性别视角纳入所有脱贫和发展实践的经验和理念,讲述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紧密结合的故事。

妇女发展与南南合作的历程和愿景

——写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前夕

■ 王晓军

南南合作体现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通过分享知识、交流技术、扩大投资贸易、能力建设、资金援助和债务减免等多种形式,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议程和项目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也可以形成三方合作,从而获得更丰富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南南和三方合作可以有力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和贯穿各个目标的性别平等原则。

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议程相互促进的主要历程

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和倡导南南合作。追溯到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万隆会议确定的十项国际合作准则的核心内容,也为南南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周总理一道载入南南合作史册的还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等。当年的领袖风采历历在目,然而,我们却很难找到女性的身影。

其实,早在万隆会议之前,亚非拉的妇女运动就已经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议题,形成跨区域合作的态势。1944年的泛阿拉伯地区妇女大会和1945年的全印度妇女大会互通书信,呼吁为共同的“东方”事业而携手努力。1949年37个国家的367名妇女代表齐聚北京,第一届亚洲妇女会议召开了,激励着整个亚洲大陆和非洲的妇女组织携手合作,也为全球妇女权利议程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万隆会议之后,亚洲和非洲妇女组织相继于1958年在斯里兰卡和1961年在埃及举行大会,把妇女发展议程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以及法律和政治权利。可以说,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妇女事业正在摆脱以往依托发达国家引导扶持的状态,开始体现了南方领导力,南南合作精神和思想先锋。

联合国把1976—1985年确定为妇女发展的十年。1975年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举办。这对于当时参会的“第三世界”代表是很大的鼓舞。她们在大会上响亮地号召,把性别平等等问题纳入国内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呼吁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充分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在性别问题上共同的诉求和愿望。首次世界妇女大会落下帷幕不久,1978年,同样在拉美大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在阿根廷召开。这次大会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的紧密结合。图为2016年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议上,中非妇幼健康合作,携手助力母婴安全专题论坛。

138个联合国成员国达成共识,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该计划明确指出“女性参与发展”是南南合作的重要行动领域之一。

联合国推动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并进的主要举措

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和联合国全系统支持实施BAPA,包括加强了在联合国开发署里面刚刚设立四年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特设局,也就是现在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职责是在全球和联合国全系统内推动和协调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当年南南合作办公室为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准备工作提供了有关性别平等等问题南南合作政策分析,《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篇在各个重要领域都强调了区域和亚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并且明确号召社会各界在性别问题上积极进行“南南对话”和“南北对话”,并建议开展南南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分享知识和经验以提高妇女赋权机构的能力建设等。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至今引领着全球性别平等的国际发展合作。2015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开篇之年,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南南合作举措。例如,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21)指出,这些项目已经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包

括柬埔寨、津巴布韦、塞拉利昂、马拉维、佛得角等国实施,为当地妇女改善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随着《北京宣言》即将进入第25个春天,南南合作的里程碑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也迈入了不惑之年。2019年3月,在联合国第二届南南合作高级别大会(BAPA+40)上,支持妇女和女童权利和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大会成果文件强调了南南合作在推动性别平等和为妇女和女童赋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明确指出在扶贫、教育、科技创新、妇女领导力和参与决策方面应加强南南合作,并建议把性别视角纳入南南合作的多种模式中。

2020年10月,为纪念《北京宣言》25周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政治宣言,也强调了通过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国支持联合国把妇女工作放在优先位置,在消除暴力、歧视、贫困等老问题上加大投入,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上有所作为,使妇女目标成为2030年议程的早期收获”。中国还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南南合作中促进妇女发展的优秀实践与未来愿景

今天,我们确实欣喜地看到,很多南南合作的优秀实践,把妇女与发展放在核心。印度、巴西、南非为斐济的妇女提供清洁能源;印度尼西亚帮助阿

富汗发展家庭经济;埃及为非洲大陆女性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巴西和莫桑比克在联合国机构以及英国发展署的支持下开展三方合作,提高各部门联动能力,致力于消除针对性别的暴力行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设置女性领导力与社会发展在职学历学位项目,帮助提升女性官员参与国家和政治经济活动能力。面对新冠疫情,印度、泰国、哥斯达黎加、南苏丹通过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南南星空数字平台积极对话,交流疫情应对中发挥女性领导力的经验。

上述南南合作案例不胜枚举,但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差距。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希望能够将这样的优秀实践推广到更多国家,让更多的妇女和女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平等参与者和重要的推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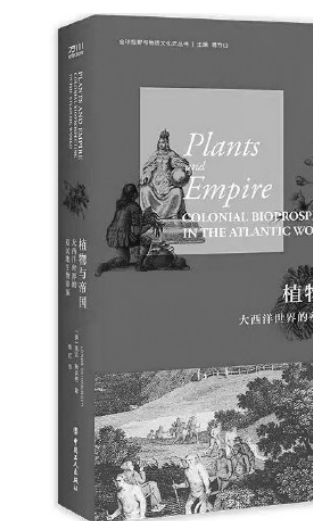
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再次成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表率。中国的脱贫成就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振了信心,提供了经验。在脱贫中,妇女发展,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健康和平等地位是重中之重。在中国大力推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向世界分享把性别视角纳入所有脱贫和发展实践的经验和理念,明确评析南南合作对当地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和支持,通过讲述南南合作与妇女发展紧密结合的故事,在共享发展的同时,实现民心 and 理念的融合。

此外,在推动妇女权利和发展的议程里,多边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到20国集团妇女会议,从东盟的妇女女童权利委员会到非盟的性别问题部长级会议,从南南合作思想者全球智库网络联盟到“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这些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正在打造着多边主义的网络化和包容性。南方国家的政府、智库和民间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力。中国的南南合作体现了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工商界妇女领袖,致力于妇女发展研究的智库和媒体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合作的机制中,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好地融入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中。

2021年,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最后十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将聚焦的主题是: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和对公共事务做出决策,以及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主题里每一个词,都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向前的每一个足音,都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和希望。几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人隔着时空对坐在我们面前,回顾历史车轮的每一个印记?今天,我们正在为人类共同的历史书写着一段新的篇章。

(作者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学人关注



在西方科技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往往被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所遮蔽,植物在这种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更长期被轻视。在新近面世的译著《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中,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通过追溯和研究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

植物旅行:后殖民视野下的博物学与性别

——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 章梅芳

前不久,四川大学姜虹送我一本她新译的著作——《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并在扉页上亲绘了一幅金凤花与毛毛虫的钢笔画赠予我,十分惊艳,令我感动。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熟悉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施宾格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西方解剖学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对女性主义科学元勘(feminist science studies)的目的、实践与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让人印象深刻。她后来还主持了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提出了性别化创新(gendered innovation)概念,是一位在学术界和科技政策界都有影响力的学者。

从植物的角度揭示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发生在欧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植物旅行故事。

以往,关于17—18世纪西方科技史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关注那些伟大发现和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科技史画卷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在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遮蔽。女性主义学术注意考察科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关心历史上身处科学共同体边缘的女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及其价值。比较而言,植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却长期被轻视了。

施宾格想要追溯和研究的便是植物的故事,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施

宾格将目光聚焦到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来自宗主国的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每天都能观察到不同于欧洲的植物,了解到与这些植物相关的丰富知识,他们的任务便是对这些植物进行采集、调查、引种、分类、命名以及提供医药试验,尽可能地把它纳入欧洲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政治秩序之中,增加并巩固帝国的财富和利益。

这一过程不只是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同时也是商业贸易、奴隶交易、殖民扩张的现实故事。这些植物学探索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科学家或医生,还充当了帝国的代理人。无论是旅行博物学家、远航的植物学助手还是在欧洲足不出户的植物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18世纪庞大的全球植物交易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是欧洲“科学—殖民机器”的代言人。可以说,施宾格从植物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知识传播的利益博弈与金凤花的性别政治意涵

不仅如此,在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以及来自英、法、西班牙、荷兰等宗主国的殖民者在共同的时空中相遇,不同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生物勘探与生物偷盗并存,博物学家的故事充满了惊险刺激的男性英雄色彩。在所谓的“生物接触地带”,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充满了策略、猎取和抗争。语言障碍、侵略造成的敌对以及欧洲人自身的认知局限,导致植物知识的传播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知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欧洲人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植物标本以满足经济上、医学上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本土的文化认知框架,这些殖民博物学家们很难去真正理解、认可并传播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和他们所构建的自然秩序。

金凤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8世纪,美丽的金凤花开遍了欧洲的植物园,但它的流产功能既没有出现在各类药典中,也没有在医药实验中得以验证,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原因何在?施宾格认为正是17—18世纪欧洲的生产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造成了

这种无知。虽然19世纪之前的欧洲,孕早期流产仍不违法,但也并不被赞许,只能秘密进行,人们因此很难就殖民地流产药物的使用与安全性问题做公开讨论。并且,这一时期欧洲的分娩实践逐渐从助产士让渡到男性产科医师手中,产科手术而非安全的流产药物成为欧洲医学共同体优先考虑的主题。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将确切的自然知识视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霸权地位的关键,人口众多是国家财富和王权荣耀乃至帝国的命脉。在此背景下,欧洲的植物探索者、贸易公司、科学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有兴趣去传播殖民地的流产药物及其知识。换言之,欧洲的生产观念、性别文化、科学观念和政治经济导向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对金凤流产知识的无知,使得19世纪的大部分欧洲妇女逐渐失去了对生育的控制权。

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带来的系统性无知

不仅如此,系统性无知的出现还源于更深层次的认知结构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林奈在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时将医药用途、生物地理分布和文化意义之类的信息与植物完全剥离,只留下抽象的拉丁文名称。他以著名的欧洲人尤其是植物学家的名字为全世界的植物命名,并在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霸权处于顶峰之际获得完全的认可,由此强化了科学由杰出个人创造的观念,刻画并巩固了欧洲精英男性植物学的光辉历史。其实质和结果如同施宾格所言,18世纪的植物命名法是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18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霸权与认知立场造成了它对其他本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无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取得普遍性的地位,而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对自身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或自我贬抑,最终不利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研究视窗

《改革开放以来女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成就、动因与展望》

作者:闫方芬 尚宇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博士生教育获得规模性、质量化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结构改善带来女性成才的机遇;国家治理层面的系统推进为女性发展事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平等为主线的多元文化促使女性主体意识凸显,平等理念的实践与深化为女性发展提供学理指导与参照范例。新时代女博士生教育发展既要关照“女”之特性,建设博士生教育层次的先进性别文化传播阵地,又要立足现实问题且面向未来打造女博士生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年第1期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作者:张艳峰

保护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关系到农村的繁荣昌盛。但是,在目前的广大农村中,我国农村妇女的地位还明显有待提高,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还有待改善与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深入进行,农村土地制度也正在发生一系列改变,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农村还普遍存在的妇女土地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现象也逐渐凸显出来,这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重申了保护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重要意义,并且在深入探究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在现实中的困境基础上,提出了几点用法律来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有效措施。

来源:《农业经济》2021年第2期

《社会学视域下育龄妇女健康体育干预的综合效应与社会机制研究》

作者:熊欢

本文通过育龄妇女健康体育干预的行动研究,观察和收集了参与者的健康运动实践经验,在社会学视域下探讨了体育介入育龄妇女健康生活的结构化过程及其健康促进的综合效应,提炼出体育干预育龄妇女健康的社会机制。研究认为:有计划的体育活动能成为育龄妇女健康“知行合一”的桥梁,增强她们对健康生活的选择能力,以此创造更多的健康机会,进而再生产或者修正与健康相关的结构环境;体育干预的社会溢出效应也可在外部为女性健康创造物质资源、社会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在结构上消解制度、文化观念束缚女性健康行动的权力。只有充分将女性主体经验贯穿于身体活动与生活方式的结构化过程中,培养育龄妇女个体与群体的健康能力,增加她们在运动中的积极体验,才会达成体育健康赋权的目標,也才能喚醒社会对妇女健康问题的关注与投入,使妇女体育参与成为一项社会责任和女性健康教育的手段。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素波 整理)